

1. 问：之前看到您在一次采访中谈到了自己远赴英国伦敦读书的经历，您谈到说在学校里，几乎所有的研究生都很明确自己是要走的职业艺术家的道路。我们很好奇，您也是这样一条中规中矩的路走下来的吗？一边打工，一边坚持创作，一边寻找机会，然后等是否有画廊接收？

刘：我那会儿说“职业艺术家的道路”，并不是就字面上看来那么积极的一种评价，只是描述艺术学院内部都会流行的一种愿景，即在毕业后得以专注从事艺术创作，并逐步受到专业圈的接纳和推举。道路之所以是道路，就是说还没到触手可及。固然“职业艺术家”这几个字在今天的定义已经比较明晰，比如通过专业代理人或者艺术机构，特别是签约画廊获得事业稳步发展的艺术实践者。但当时（和艺术论坛？）谈起这个，更多是在说一种心理上的自我暗示，应该直接用“艺术家梦”的说法更准确一些。

在我去留学那时段，已有很多同龄人在国外接受艺术课程，这些年再看就更习以为常了。若是了解一下今天在欧美国家名校毕业于 MFA 课程的年轻艺术家的境遇，不要说大多数人很难获得画廊系统的青睐，要是没有来自家庭的经济后援，连个最基本的小工作室也很难维持得起，更不用说持续产出了。蛮无奈的是，即便现实情况进展不佳，他/她们在毕业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会认为自己仍在参与严肃而且专业的艺术生态。不像国内美院毕业生的择业愿景不那么宽泛，欧美体制内毕竟还有许多公开竞争的奖金、驻留、美术馆项目。有行动力的年轻艺术家也会集资组织群展和艺博会自产自销。

我看身边同龄人的体会是，如今的欧美国家的艺术学子除了进入专业通道，几乎没有什么更好的发展前景。就算进展艰难，艺术的圈子内部还是要比社会一般层面精英很多，让多数人还是有着异常大的意愿要坚持下去。其实，这种本来不成为问题的问题还是因为欧美近 10 年来经济发展失速，社会资源两极化导致阶层壁垒越来越难以跨越所致。即便是艺术这种传统上一直运行良好的蹊径也在开始阻塞，从而变得虚幻起来。类似的剧本，或许也开始可见于国内的北京，上海，杭州，广州。

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体会最深的就是年轻一辈艺术家悬浮于世的失重感和对未来无穷的困惑。我作为外来者，特别是作为中国人，个人的情况更加复杂。一方面进入当地专业圈的机会更少，另一方面又逐渐远离国内的情况。还要设想自己必须实现从内致外的差异性，自觉远离行业的主流样貌，用严肃的工作理念挖掘真正属于自己的追求。但如果想要规避样式化的当代艺术常规，实践艺术的新可能，时间和精力投入基本上是无止境的。那种策略性的沿用并改造其他人的既有套路（方法论），迅速整合出自己的套路，在短时间内寻求被艺术市场接纳是我和我所在的学术环境所鄙视的路子。所幸在国外的环境里，个人对生存还可以要求不高。要是放在国内这种家庭为社会单位的文化环境里，加上在参照身边同龄人的境况后，多数人恐怕是难以接受的这种回馈无期的代价的。

因为要解决经济上面临的实际状况，我在交完毕业论文的第三天就去打工了。加上想法上的困扰，我在创作上停止了八个月的时间。在之后近 2 年的时间里，一边打工一边创作的效率一直不算高，我也认为自己还没有足够多的积累来帮我自信于自己的方向。日后回想，很可能是种种当时的不利条件反过来让我受益良多。一方面切身的体验了发达资本主义和完善税收制度下的劳动改造，另一方面也逐渐明了艺术毕业生所期待的对接专业艺术世界恐怕是并不会那么自然而然。

事情的转折出现在我回国后。先前那些我在伦敦的摸索，得到了超出我想象的肯定声音。在很短的时间内，便有两家在国内享有名誉的画廊开始代理我的作品，也在专业环境上的改观带来的完全不同的视点。从事当代艺术的实践开始变得有条件，也变得身负责任。此外，可以很近距离的看到，自身和身边那些有效的当代艺术参与最终总是关乎拥有资源的策展人，拥有影响力的媒体以及画廊的战略部署，最好三者兼顾。很快，专业道路就有异化成职业道路的迹象。我本着走“远路”的愿望，却因为种种因素的组合影响，最后绕了条“近路”。我可以认为这也是一种幸运，看到了许多本不太想看到的景致。

如今全球都在同步践行的成熟艺术家和年轻艺术家梯队整备，以及市场和学术在传播上的配合，让当代艺术的世界显得越发制度化，也越发可疑乃至无聊。要我说专业以及职业之于艺术家，只能说都是一本本留满作案手脚的糊涂账。年轻艺术家需要为何种清晰度的目标所激励并投身工作？艺术家的选择和行业的选择有多少比例是关乎艺术上的追求？艺术家们是不是都在争相竞赛如何更乖巧地回应系统的话题设置？奥运后的那几年和今天相比，实践艺术中国年轻艺术家分别缺少过哪些条件？今后自觉，持续地实践的又会依据什么样历史经验？到头来，可能还是保持“业余”精神，会有点可能性。

**2. 问：您的生活哲学收到了中西方哪位或哪些艺术家的影响？**

刘：我不清楚问题里的“生活哲学”具体是指什么。在我有点儿漫长的“学生阶段”里，对我在如何看待世界以及看待艺术的基本态度起到过影响的艺术家说过很多，今天看来影响显著的有：耿建翌，Maurizio Cattelan, Christian Jankowski, 黄永砵, Mark Wallinger, 王广义, Roman Signer, Martin Creed, Francis Alys。

**3. 问：人们都说艺术家对生活应永远充满激情，但我相信压力、焦虑一定都是有的，更何况如今在政治和资本的罗网下，历史的重负下，艺术家似乎更难有所作为。您是如何看待这一点的？有没有一些特别的生活哲学，做一些调剂？**

刘：或许当代艺术本质上就是艺术家将现代化以来的社会性的焦虑和压力在个人层面的转换出口。如在积极看待这种压力的前提下，艺术家个体的历史经验和知识经历是可以成为他/她艺术实践的源泉。理论上，如果这份经历足够独到，他/她的艺术上的张力也理应能够有所体现。当然，这么说，可能会落入一种唯生产力至上的逻辑里去。毕竟年轻艺术家的投入全职实践的时间都在10年以内，在这个阶段所比拼的多是视觉语言的完善程度，特别是对媒介的敏感度和掌控能力。许多艺术家在完成个人风格确立的工作后，如果没有哲学结构的思考，追问或者研究性的定力在后面推动，很大概率就是成为自我重复的样式主义艺术家。

相应的，外在的“网罗”和“重负”主要来自于当代艺术行业中的垄断。即便是受到业内认可的艺术家的也必须竞争不断变幻的学术准入和市场资源，加上今天所谓“艺术的成就”高度依赖于传播，没有几个艺术家的工作可以持续适用于话题性的推广。国内行业的特点是更追求的不断翻牌的注意力规则，迫使艺术家遵从于从一个瞬间到另一个瞬间的弹簧型人生，而远不是理想中连续攀登的事业图景。年纪轻轻就声名鼎沸的艺术家也需要准备好从话题中心滑落的心理考验。同时，国际上对中国当代艺术的选择标准仍然严重滞后，加上国内的画廊大多都不自信于推广艺术家的理念，差异性又做得不充分，

许多艺术家作为有限的局面并不出奇，可以说是这个行业目前制度粗陋，趣味单一，无暇顾及所致。

关于“调剂”，我的体会是艺术家回头来还是要首先自己理清楚从事艺术的最大缘由。如果发现因内在的动力催生的实践有衰竭的现象，艺术家只能自我承担。或许是和利益有关的因素干扰太多，或许就是需要停止工作一段时间，等待重拾信心和发现自我。

其次是了解清楚自己的工作的价值和问题所在。考虑到今天公共传播的门槛可以说接近于无，我不认为艺术家仍有理由不理睬外界的意见埋首工作。持续勤奋地收集反馈，才可能及时更新对自身实践的制图工作。只不过这个部分很难做到客观和充分。艺术家身处的行业体制决定了一手可信的反馈非常稀有。多数情况中，艺术家只能在猜测的基础上汇总出模棱两可的判断。另一方面，我也认为有限度并有条件接纳外界反馈的才是心理成熟的艺术家。毕竟艺术家自己才是掌握最全面有关自身创作情况的人，外在的意见其实只是提供了另一种视角和参照。我觉得清醒的艺术家会有能力从批评甚至质疑中汲取营养，并将之转化为自己的一部分。

再次是我觉得真正合格的当代艺术家能够主动制造机会而不是坐等机会上门。我一直认为任何一个当代艺术家的事业都不可能依赖现有艺术世界的能量持续运转，能够意识到这点的艺术家总能把在当前看来并不那么艺术的生活和学科资源带入自己的实践，不断刺激和扩张艺术的可能性。对我而言，我自己的生活就应该不断主动给自己制造“麻烦”（变化和偶然），尽管这些“麻烦”（变化和偶然）很可能也意味着更多的压力和焦虑来源。